



布老虎丛书 散文卷

好运设计

● 史铁生/著





布老虎丛书 散文卷

好运设计

● 史铁生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好运设计

著 作 者:史铁生
责任编辑:高 勇
责任校对:安波舜
封面设计:李法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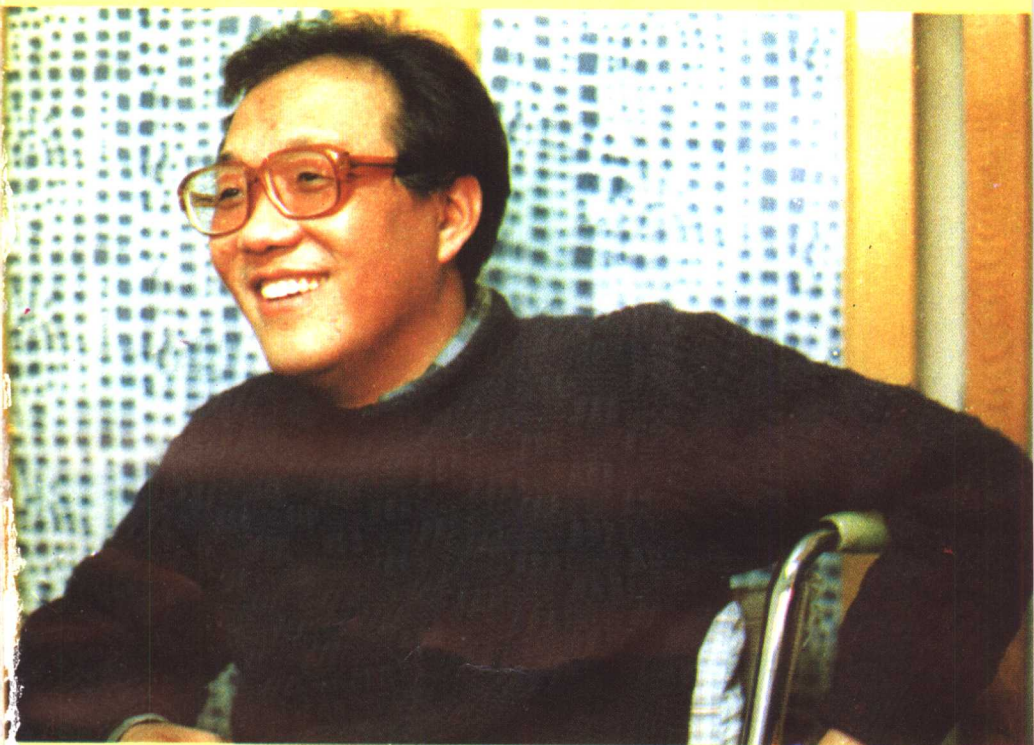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印 刷 者: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山西省新华书店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89 号

字 数:200 千字
开 本:850×1168 $\frac{1}{32}$
印 数:20,000
印 次:1995 年 3 月第 1 版

ISBN 7 5313-1484-3/I·1316
定价:16.80 元



史铁生，1951 年生于北京，初中毕业后去延安插队，1972 年双腿瘫痪转回北京在某街道工厂做工 7 年，后因病情加重回家休养。现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理事，合同制作家。主要作品有：《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插队的故事》、《命若琴弦》、《礼拜日》、《原罪·宿命》、《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我与地坛》等。其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并有英、法、日文译本在国外出版。

目 录

合欢树.....	1
随想与反省.....	5
答自己问	15
自言自语	41
我的梦想	67
文革记愧	71
康复本义断想	78
“安乐死”断想.....	86
我与地坛	93
好运设计.....	116
我二十一岁那年.....	139
笔墨良心.....	154
没有生活.....	156
关于死.....	159
关于生.....	164
职业·事业.....	170
关于平等.....	178
随笔十三.....	183
玩具.....	205
角色.....	209
姻缘.....	213

相逢何必曾相识·····	218
一封家书·····	227
黄土地情歌·····	231
游戏·平等·墓地·····	240
“嘎巴儿死”和“杂种”·····	250
也说“散文热”·····	253
获“庄重文文学奖”时的书面发言·····	255
爱情问题·····	257
神位 官位 心位·····	270
记忆迷宫·····	277
体育 意志 信心·····	286
告别郿英·····	289
墙下短记·····	291
给安妮·居里安的一封信·····	301
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	307

合欢树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

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膀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象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

的影子吗？小院儿里只有那棵树。

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1984年11月

随想与反省

——《礼拜日》代后记

都在说文学的根，说的却未必是一回事。好比如，小麦是怎么从野草变来的是一回事，人类何以要种粮食又是一回事。

不知前者，尚可再从野草作起。不知后者，所为一概荒诞。并非说前者不重要。

“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

“寻根意识”也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眼下活得卑微，便去找以往的骄傲。一种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为地球上最灿烂的花朵找一片可以盛开的土地。

阿Q想找一头大于王胡所有的虱子。鲁迅的意思是把阿Q、王胡、乃至小D都消灭，找出真正人的萌芽。

至于鲁迅倒比阿Q多着痛苦，乃至人倒比猴子活得艰辛等事，另当别论。

什么是文学的根呢？是文化？文化是什么呢？《辞海》上说，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真占得全！全得象是废话。好在《辞海》上对文化还有一种狭义的解释：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想必文学界谈论的是这后一种。又查了“意识形态”条，得这样的解释：亦称“观念形态”，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

似可对文化作如下简明的理解：文化是人类面对生存困境所建立的观念。

欲望无边，能力有限，是人类生来的困境。所以建立起诸多观念，以使灵魂有路可走，有家可归。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说文化是文学的根，犹言粮食是大米的根了。譬如树，枝与干，有同根。文学与哲学、宗教等等之不同，是枝与枝的不同。文学的根，也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困境。

面对困境，文学比其它所有学科都更敏感。文学不仅用着思考，更用着观察，不仅看重可行的实际，还看重似乎不可能的愿望。因此，它不同于哲学的明晰（所以它朦胧）；不

同于科学的严谨（所以它耽于梦想）；不同于法律的现实（所以感情不承认法律，法律也不承认感情）；不同于宗教的满足（所以叛逆常是其特色）；不同于政治和经济的立竿见影（所以它的社会效益潜移默化）。据此，它便也不同于教育和宣传。

要求一切都实际且明晰，岂止是在扼杀文学，那是在消灭理想和进步。

波德莱尔说：“诗不是为了‘真理’，而只是它自己。”我想这话有四个意思：一、人所面对的困境，永远比人能总结出的真理要多。二、文学把侦察困境的艰险留给自己，把总结真理的光荣让给别人。三、一俟真理呈现，探索早又向着新的困境了；只有在模糊不清的忧郁和不幸之中，艺术才显示其不屈的美。四、绝不是说，诗不通向真理。

已有的文化亦可为人类造出困境，当然也可成为文学的根。同样，已有的文学亦可为人类造出困境，文学又成文学的根。究其为根的资格，在于困境，而不在其它；惟其造出困境，这才长出文学。

歌德说：“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我想此话有三个意思：一、人类的困境象人类一样古老，并将随人类一同长久。二、若不面对这困境重新思考，便不会懂得古人思考的到底是什么。三、古人的思考遗留下的谜团，要求今人继续思考；困境是古老的，思考应该有崭新的。

过去的文化是过去的人类对困境所建立的观念。今人面对困境所建立的观念呢？当然也是文化。所以文化不等于涉古，涉古者也不都有文化。阿城说有兩種文盲，一種文字盲，一種文化盲。這樣分清真好。但能識得字的就會抄書，未必不是文化盲。

因而想到，所謂知識分子，怕也該分作兩種。《辭海》上說，知識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又說，知識分子“在革命運動中往往起着先鋒和橋樑作用。”前後二語，實在是兩個不宜混淆的概念。

博士和教授不願沖鋒卻樂得拆橋者，永不乏人。從而又想到學歷、文憑、职称與文化素養的不同。想到臨摹與創作的不同。想到無數畫蝦者與齊白石的不同的不同。

沖鋒必是向着人類的困境，架橋便是做着建立新觀念的工作。舍此而涉古，莫如去作古玩商，單知道舊貨的行情即可。無論架橋還是蓋房，當然離不開基礎。真先鋒從來不是歷史虛無主義，不輕看學問也不會無視傳統，與古玩商的區別在於：一個是創造，一個是典當。假如沒有創造，就只剩下典當一條活路。每見洋人把玩中國當代文學，露出考古家的興致，深感並非國人的驕傲。

某鄉村，有一懶漢，爹娘死后，遂成窮鬼。初春，縣上下來了命令：村村辦起养猪場！隊長忙不迭從集市上抱回兩頭猪娃。眾乡亲怜这懶漢謀生無計，便推他作了飼養員。秋后，懶漢把猪娃養成毫不見長大的兩具尸首。分紅時，懶漢

破天荒得到一千工分的钱粮。众乡亲先是祝贺，转而又想：是他养了一年猪呢，抑或猪养了一年他？

老子，几千年后被外国人看出了伟大。同一个老子，几千年来中国人从他那儿学的是诡诈。后来中国人发现外国人发现了老子的伟大，便把老子的书抄在自己的作品上，不料这作品却不伟大。自己久不伟大，便起了疑心，也说中国人崇洋媚外。倘有洋人也不说他伟大，便说也有不伟大的洋人。倘有不伟大的洋人说他伟大，便把这洋人的名姓一串串常说在嘴上，受用终生去了。

说某些“文学作品”没有文化，大概是指此类文字对人类的困境压根儿没有觉察，更不敢用自己的脑袋作出新鲜的思索，绝不是说它没有洋征古引。

文学不是托盘，托着一只文化出来，撕扯在众人的小碟子里，自己又回去。

历史感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感必是过去与现在与未来的连接，这连接不是以时间为序的排列，而是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

遗精生不了孩子。避孕也生不了。近亲通婚会养怪物。但要创造。

当斗牛场四周坐满了嚼着口香糖的看客之时，场子里正

在发生的已经不是较量，而是谋杀。拳击还是平等的蠢行，西班牙式的斗牛却是合伙在残害一个。我不明白西班牙人在欣赏什么，是斗牛士的卑鄙与虚荣？还是那牛的愚蠢与不屈？

对牛来说，不屈的鲜血光芒四射！

对人来说，这仿古的游戏，却把远古的光荣化作了今日的悲哀。

刘易斯跑起来，让人享受了艺术的美。这美来自那谐调动作所展示的自信力量，来自对前人的超越，来自于他勾引得我们还要希望看进一步的超越。

世界纪录却标出了人的局限。现在是九秒九三、二米四二、八米九〇……将来便有九秒、三米、十米的成绩，局限还是局限，并且定有极限。这困境属于全人类。

当今世上便只有奥林匹克的神火能把全人类召唤在一处，齐对着命运之神唱出自己的心愿。精神在超越肉体之时，上帝不得不永远赐我们以艺术。

我的朋友陈志伟说：“超越不是前进，不是没边没沿的飞升。超越的对象是现实，现实是超越的基础，二者一刻也不能互相脱离。超越是对现实的把握，超越是更大、更深、更广的现实。”

我理解：所谓超越自我，并不意味着跑百米的跑出九秒九二，跳高的跳出二米四三。我理解：长寿和自杀都不能超越死亡，纯朴和出世都不能超越异化，苟安和金牌都不能超越困境。我理解：把陈志伟这段话中的现实二字换成自我，便

是超越自我的含义。我理解：把握现实与自我，正说明我们不能指望没有困境，可我们能够不让困境扭曲我们的灵魂。于是有一种具有更博大的胸怀、更深刻的智慧、更广泛的爱心的人类，与天地万物合成一个美妙的运动，如同跳着永恒的舞蹈。

这样的舞蹈多么难跳。难到常让我们丧失信心。不过，他妈的我们既然活着！

从人的困境出发建立观念，观念是活的，一旦不合人的需要，改革起来也容易。从已有的观念出发构造人性，人性就慢慢死掉。死掉人性的人去教条，常常是再把活着的人性屠杀一回，立起一个更坚固的囚人的观念。

对特异功能一事不信、不听、不看，只因它不符合已有的一种主义。已有的这种主义也是一种文化，然而只从这种文化出发的人却变成文化盲。

也可能是这样的人没弄懂这种主义。也可能是这种主义又一次证明了那句名言：生命之树常绿，理论往往是灰色的。

我们平时不再“之乎者也”地说了，可小说上出现了“之乎者也”却不妨碍这可以是一篇好小说。同样，我们学一点外国的说话又怎么不行呢？事实上，现在的中国人就比过去多了幽默感，外国小说和电影里的翻译语言未必没起大作用。语言习惯的不同，不单是单词排列得有异，更多的可能是思维方式的差别。中国的思维方式太有必要杂交一下，不